

四川考古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

161083
133
654

四川考古论文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四川考古论文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文物出版社

(京)新登字 056 号

封面题签 苏秉琦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刘京生

责任编辑 李 莉 黄文昆

四川考古论文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美通印刷厂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787×1092 1/16 印张:15

ISBN 7-5010-0921-X/K·398 定价:68元

序

苏秉琦

“四川考古学是大学问!”我几次讲过这个话。

十多年前我讲过,根据是广汉月亮湾的考古材料。此前,考古学家们在四川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也写了不少研究文章,发现的文物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广汉月亮湾的一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代成系统的破陶器的发现,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这个发现不能小看,关键是自成系统,使我们看到了四川地区古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特色,也为研究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等问题提供了具体的材料。这是我1984年在成都看到材料时产生的一点感想。当时我鼓励四川的考古工作者照着这个路子在这一带多做工作。

几年前我又讲这个话,根据是1985年以后的新材料。1986年,三星堆两个坑和青铜人、青铜器等大批精美文物的发现,使我们对四川古文化的认识耳目一新,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如果说,1984年我在成都讲四川战国青铜器很有特色,但它们的体系还没有摸到,汉画像砖艺术水平很高,但它们的系统渊源还不清楚,那么现在就可以说,已经把它们的渊源推到了三星堆时期。战国青铜器也好,汉画像砖也好,都与三星堆的风格神韵相似。三星堆灿烂的古文物说明了四川古文化的成功。这个成功是全方位的。当年的三星堆人并非落荒而逃,他们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了。

今天我还讲这个话,根据是四川考古还有那么多的谜,有待我们去一个一个地解开。

1993年以来,我讲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的问题。毫无疑问,三星堆已进入了“国”,而且是方国。它的古国阶段是什么模样?我们还不清楚。

中原地区古国的出现,从洪水到治水是至关重要的。四川也有自己的治水传统。李冰父子治水成功,都江堰至今已用了2000多年,灌溉了这么大片土地,哺育了多少代如此众多的人口,现在的工程哪个可与之相比?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李冰父子手中完成的,但我绝不相信这治水是一次成功的。四川有自己的治水时代——古国时代。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四川考古也是一篇大文章,不仅仅是巴蜀文化问题。巴蜀文化也没有搞清楚。还有三峡考古、川西考古,与楚文化的关系、与滇文化的关系、与其他周边文化的关系,以及与之

相关的西南考古、南方考古,甚至中国考古、东南亚考古问题,等等。过去,我们说四川古文化是中国几个古文化之一。这话至今不错。但如换一个角度,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问题,则又有了新意:四川古文化是中国古文化的中心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四川考古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阶段。

《四川考古论文集》汇集四川及省外考古学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 19 篇,计 25 万字,内容涉及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流及特征,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巴蜀文化的面貌、特征、年代分期及文化族属、宗教信仰和科技考古等诸多方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四川考古前进的脚印,尽管并不全面,但我希望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和新阶段的起点。

三峡考古,是一股东风;第十次中国考古学年会在四川召开,也是一股东风。大学问要一步步地做,大文章要一字字地写。我希望四川考古工作者能够借东风,扎扎实实地工作,从摸陶片做起。1984 年在成都会议上我就强调这一点,现在仍须强调这一点。我相信,四川考古工作者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开拓出四川考古的崭新局面。

目 录

序	苏秉琦	(1)
四川史前考古学的希望	贾兰坡	(3)
略论四川地区的细石器	李永宪	(6)
忠县谡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分析		
——兼论川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及早期青铜文化	王 鑫	(19)
老关庙下层文化初论	赵宾福 王鲁茂	(44)
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	邹 衡	(57)
三星堆文化在我国文化总谱系中的位置、地望及其		
土地崇拜	俞伟超	(59)
从对三星堆青铜器年代的不同认识谈到如何正确理解和		
运用“文化滞后”理论	李伯谦	(64)
《祭祀坑说》辨析	张肖马	(70)
广汉三星堆出土玉器考古地质学研究	苏永江	(79)
人神交往的途径——三星堆文物研究	赵殿增	(91)
四川西部三种文化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王燕芳	(104)
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的再考察	李学勤	(118)

成都十二桥遗址群分期初论	孙 华 (123)
四川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问题	宋治民 (145)
“西南夷”陶器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刘 弘 (153)
西南地区的石棺墓分期研究	
——关于“石棺葬文化”的新认识	陈祖军 (171)
汉画芝草小识——从四川出土的画像砖画像石谈起	王仁湘 (201)
试说前蜀王建永陵发掘材料中的道教遗迹	张勋燎 (213)
川江水文石刻与巴渝修楔习俗	胡昌健 (224)
编后记	沈仲常 (231)

序

苏秉琦

“四川考古学是大学问!”我几次讲过这个话。

十多年前我讲过,根据是广汉月亮湾的考古材料。此前,考古学家们在四川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也写了不少研究文章,发现的文物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广汉月亮湾的一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代成系统的破陶器的发现,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这个发现不能小看,关键是自成系统,使我们看到了四川地区古文化在不同时期的特色,也为研究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等问题提供了具体的材料。这是我1984年在成都看到材料时产生的一点感想。当时我鼓励四川的考古工作者照着这个路子在这一带多做工作。

几年前我又讲这个话,根据是1985年以后的新材料。1986年,三星堆两个坑和青铜人、青铜器等大批精美文物的发现,使我们对四川古文化的认识耳目一新,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如果说,1984年我在成都讲四川战国青铜器很有特色,但它们的体系还没有摸到,汉画像砖艺术水平很高,但它们的系统渊源还不清楚,那么现在就可以说,已经把它们的渊源推到了三星堆时期。战国青铜器也好,汉画像砖也好,都与三星堆的风格神韵相似。三星堆灿烂的古文物说明了四川古文化的成功。这个成功是全方位的。当年的三星堆人并非落荒而逃,他们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了。

今天我还讲这个话,根据是四川考古还有那么多的谜,有待我们去一个一个地解开。

1993年以来,我讲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的问题。毫无疑问,三星堆已进入了“国”,而且是方国。它的古国阶段是什么模样?我们还不清楚。

中原地区古国的出现,从洪水到治水是至关重要的。四川也有自己的治水传统。李冰父子治水成功,都江堰至今已用了2000多年,灌溉了这么大片土地,哺育了多少代如此众多的人口,现在的工程哪个可与之相比?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李冰父子手中完成的,但我绝不相信这治水是一次成功的。四川有自己的治水时代——古国时代。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四川考古也是一篇大文章,不仅仅是巴蜀文化问题。巴蜀文化也没有搞清楚。还有三峡考古、川西考古,与楚文化的关系、与滇文化的关系、与其他周边文化的关系,以及与之

相关的西南考古、南方考古,甚至中国考古、东南亚考古问题,等等。过去,我们说四川古文化是中国几个古文化之一。这话至今不错。但如换一个角度,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问题,则又有了新意:四川古文化是中国古文化的中心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四川考古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阶段。

《四川考古论文集》汇集四川及省外考古学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 19 篇,计 25 万字,内容涉及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流及特征,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巴蜀文化的面貌、特征、年代分期及文化族属、宗教信仰和科技考古等诸多方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四川考古前进的脚印,尽管并不全面,但我希望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和新阶段的起点。

三峡考古,是一股东风;第十次中国考古学年会在四川召开,也是一股东风。大学问要一步步地做,大文章要一字字地写。我希望四川考古工作者能够借东风,扎扎实实地工作,从摸陶片做起。1984 年在成都会议上我就强调这一点,现在仍须强调这一点。我相信,四川考古工作者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开拓出四川考古的崭新局面。

四川史前考古学的希望

贾兰坡

1984 年我写过一篇题为《四川是研究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的文章，发表于《四川文物》第 4 期。从 20 年代起到 30 年代，迭次有中外人士前往那里寻找恐龙和哺乳动物化石。我在 1936 年也到那里去采过大量化石标本。哺乳动物化石最集中的地点是在万县盐井沟。在那里石灰岩的山坡上，有许多井式的洼槽，其中填满红色堆积物，堆积物中埋有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此种动物群为长江以南的典型代表，与华北的相比显然有异。这个动物群过去认为属于中更新世，在华南延续的时期很长。自从湖北长阳县下钟家湾村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长阳人”化石，这个动物群的时代延迟到了晚更新世。

四川省是个多山地区，中心为巨大盆地，其间又有长江相隔南北，成了动物南北迁徙最大的障碍。1936 年我和一位技工把盐井沟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又到湖北宜都洋溪红色泥岩层中寻找化石，先找到的是一个龟背，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一具距今约 5000 万年的被德日进和杨钟健先生命名为假恐角兽的头骨。经过他们的研究，认为这种动物生存的时候宜昌一带还是一个很大的湖泊，尚未形成长江，河道是在距今数百万年前的新生代后期才在大峡谷以东地段开通的。这一认识充分说明了四川西部在较早时候还是动物迁徙的通道。而且，中国西部是上升地区，即使到很晚的时期道路还是可以通行的。

大约在十年前，我和卫奇在好友人类学家秦学圣先生的陪同下前往川西地区进行地质旅行时，在雅安附近正赶上那里在进行考古发掘。使人感兴趣的是，他们所发现的细石器与在华北所发现的相同，特别是锥形石器及长石叶与华北的相比毫无二致，可以肯定属于同一技术系统。标本是在半固结的泥坑中发现的，估计时代不会早于新石器时代。可惜至今未见到他们发表的文章。

在中国北部，以锥形或船形石核为代表的细石器，普遍见于东北各省、内蒙古、宁夏，向西一直分布到新疆喀什，向东分布到日本、韩国、西伯利亚以至北美，作马蹄形的分布。同类的细石器平原地带很少见到，只在河南开封有少量分布。看来中国山区是古人类分布十分重要的地带，四川省也不例外。有关同仁对四川山区的洞穴或开山修路之地应给以充分注意。我于 1978 年以《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为题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天津人民出版社）。在这本小册子里曾提到：“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

地的范围之内。云南不仅发现了拉玛猿(现在又改名为禄丰古猿)化石,而且在元谋的上那蚌地方距今 170 万年的地层中还发现了元谋人(直立人)的牙齿和石器,这就是有力的证据。”

当然我们也不能小看青藏高原这块地方。今天那里是山高谷深,皑皑白雪,可是当地质时代的第三纪时并非如此。中国科学院组织了珠穆朗玛峰综合考察队,1966~1968 年连续三次到那里进行考察和研究。地质调查所郭旭东曾发表论文说:“仔细研究该植物群的现代生态环境,表明本区在上新世末期,希夏邦马峰地区为湿潮的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达 10℃左右,年降水量约 2000 毫米。”(《中国科学》,1974 年第 1 期)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地质、古生物工作者于 1975 年也到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和希夏邦马峰北坡海拔 4100~4300 米的吉隆盆地(28°N,85°E)调查,在距吉隆县城 9 公里的地方发现了时代为上新世的三趾马动物群,除三趾马外,还有鬣狗、大唇犀等,证实那里属于温暖气候。由于上述的原因我赞成人类起源“亚洲说”。这个中心可能在亚洲南部大陆,即从巴基斯坦以东和我国广大西南部地区。特别是近些年来,有许多早、中更新世的人类和古文化遗物发现,从而对这个假说更坚定了信心。

打开四川省地形图,就可以看出它在人类发展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盆地的东缘所发现的巫山人化石尤其令我高兴。由四川省重庆市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万县地区博物馆和巫山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组成的科学考察队,在巫山大庙进行了为期五年(1984~1988 年)的野外考察和发掘工作。他们不但发现了许多脊椎动物化石,还发现了人类化石和石器,真可说是“功夫不负苦心人”。1991 年他们出版了一本以《巫山猿人遗址》为题的著作。

黄万波、拉塞尔·克洛乔、顾玉珉、罗伊·拉里克、方其仁、亨利·施瓦茨、约翰·德·福斯和威廉·林克等,在英国《自然》378 卷(1995 年 11 月 16 日)上发表《在亚洲发现的早期人属和伴生的石制品》,之后出现某些异议,乃是正常现象。翻开历史看,每有重大发现,不同的学者总有不同的评价。所谓“一锤定音”,几乎是没有的事。

今年新年期间,我收到在美国的我的学生张俊山于 1995 年 12 月 18 日给我的贺年信。信中说:“不知巫山材料的发现,在国内的反映如何?在美国确实是引起了很大的重视。看到我国古生物、古人类研究取得的这些新成就,真令人高兴。”我在此也不免要说些真心话。其实在国内并未引起什么反映。关于巫山人化石的发现,不知在什么地方引用过一次,惹出了一些人的指责。至于所存在的问题却并未指出。我总觉得,科学要发展,就必须切磋琢磨,互相商量研究,学习长处,纠正短处,才会有大的成就。

过去,我和杨钟健先生合写过一篇文章《大力开展第四纪冰川调查和深入研究》(1984 年《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一集,1~4 页),其中曾引用鲁迅先生在《未有天

才之前》里的一段话。他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生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他是站在保护青年作家的立场上的，但愿科学界同仁能以鲁迅先生的话为鉴，以满腔的热忱来保护学术园地的“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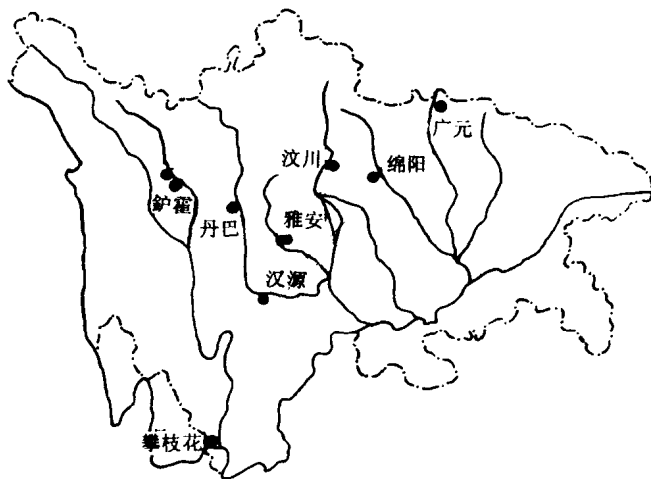
略论四川地区的细石器

李永宪

考古材料表明,中国的细石器不仅在北方有着广泛的分布,南方也发现有这类遗存,尤其是我国的西南地区,细石器遗存分布相对集中,数量较多,延续的时代也较长。近些年来,四川境内发现了多处含细石器的遗址、墓葬和石器地点,这不仅丰富了四川地区的考古学内容,同时也为我们认识盆地内某些考古学文化的性质与特征提供了一些依据和线索。本文拟对已发表的四川细石器材料作一些粗略的分析和讨论,希望能有助于加深对四川地区原始文化的某些认识。

一 四川境内的细石器遗存

迄今为止,四川境内发现含细石器因素的古文化遗址、墓葬及石器地点大约近十处,主要分布于盆地北部、西部及西南边缘地带的长江支流(嘉陵江、岷江、雅砻江、大渡河、金



图一 四川细石器地点分布示意图

沙江等)地区(图一)。其中比较重要的地点有以下几处。

(一)攀枝花回龙湾洞穴遗址^[1]

回龙湾洞穴遗址地处金沙江北岸支流把关河畔,洞穴高出河面约 300 米,海拔高度为 1550 米。该遗址发现于 1987 年,当年曾进行了小面积的试掘,洞内堆积厚约 2 米,从上至下分为 3 层。文化遗物主要出土于 2、3 层。这两层堆积之间形成了发育不完全的钙板,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绝大多数为现生种,也有少量绝灭种,初步推断回龙湾洞穴文化堆积的年代为距今 1.2~2 万年之间。该遗址共出土石制品 700 余件,包括有打制的砾石石器、小型的石片石器和大量较为典型的细石器,其中细石器主要选用脉石英、燧石、玛瑙、白玉、青玉、玉髓及水晶等石料制作而成。细石器类型包括锥状、漏斗状石核和船底形、楔形石核等。剥制的细石叶十分精致,最小的细石叶仅长 1 厘米、宽 0.5 厘米、厚 0.1 厘米。细石器的工具类型主要有雕刻器、锥钻器、琢背小石刀、斧形小石刀、指拇状刮削器以及细石叶石刀等。从石器工艺面貌上看,该遗址具有比较典型的细石器技术特征,并已广泛运用间接法技术压剥石叶和修整工具。与细石器共存的打制石器、磨制骨器等其他文化遗物的特点表明,该遗址具有较明显的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

(二)广元中子铺遗址^[2]

中子铺遗址位于嘉陵江上游支流浅溪河南岸,海拔约 670 米。该遗址于 1990、1991 年两次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共出土和采集到一万数千件细石器标本,经¹⁴C测定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 4000~7000 年之间。发掘者认为中子铺遗址包括了早晚两期文化遗存,其中“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是遗址的主要内涵”,大致年代为距今 6000~7000 年左右,并建议命名为“中子铺文化”^[3]。该遗址出土或采集的细石器(图二)多以黑色燧石为原料,另有少量的石英岩;石叶和石片的产生主要采用间接法,同时也采用直接法打片;细石器类型包括楔形石核和锥形、漏斗形、柱状石核等,后者在数量上略多于前者,其中楔形石核比较显著的特点是核底多呈刃缘状,与我国北方地区细石器中楔形石核多为侧边刃的特点不同。中子铺遗址的细石叶十分典型,基本上是用间接法产生,两侧平行,远端多向内弯,背面有一至三条纵脊,形态有尖尾和平尾之分。细石器工具类型以弧刃刮削器、条形尖刮器、直刃长刮削器以及石核式刮削器为主,也有少量尖状器,此外带刃的小石片也较多。该遗址与细石器共存的还有绳纹夹砂红褐陶片。这些陶片火候很低,陶质疏松,器形大致有罐、碗、小三足器等类型,具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文化的某些特征。

(三)雅安沙溪遗址^[4]

沙溪遗址地处青衣江北岸一级阶地上,海拔约 550 米。该遗址发现于 1985 年,当年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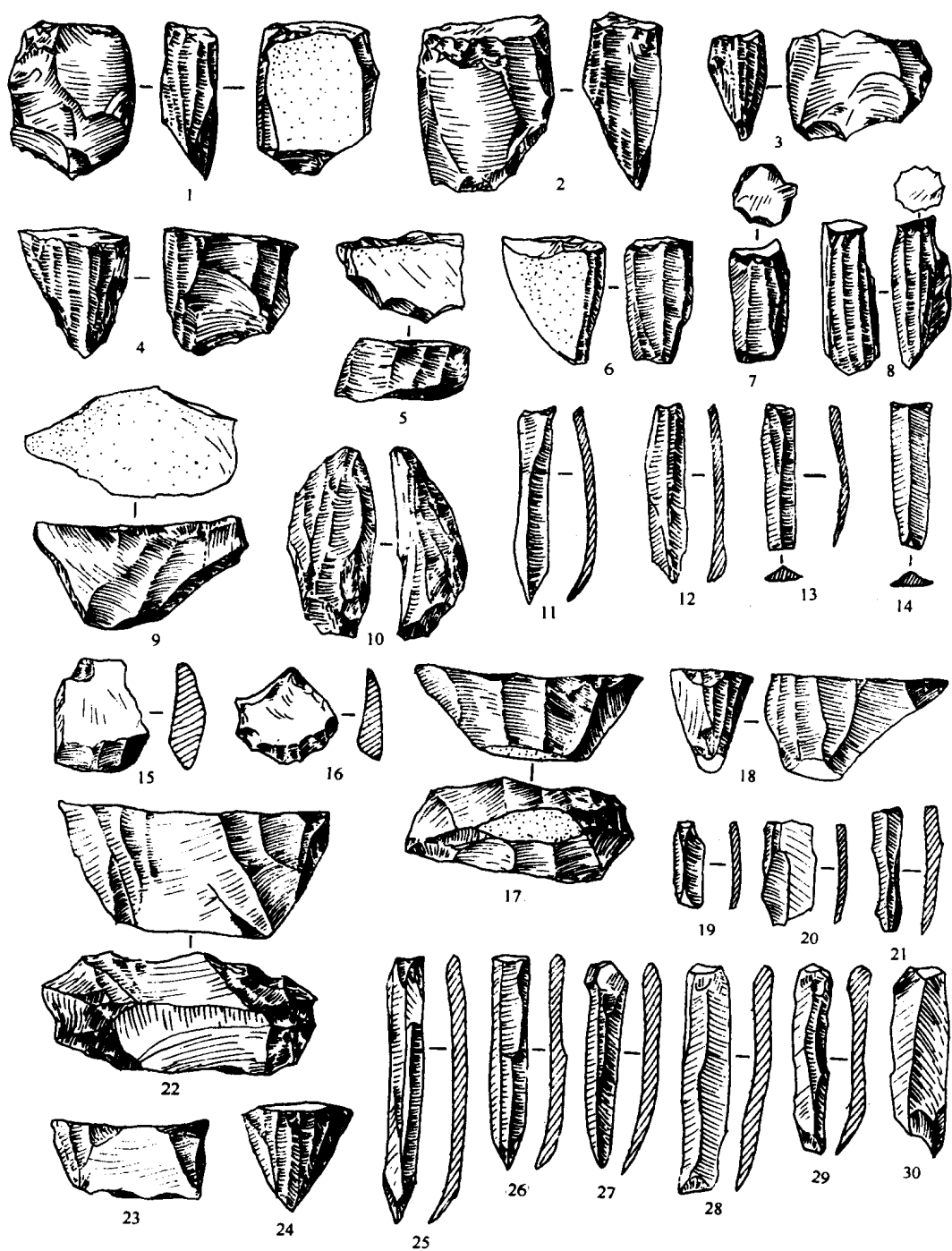
次年进行过两次发掘,在遗址的“下文化层”中出土 17 件细石器,加上地表采集品共计 33 件标本。经¹⁴C测定遗址下文化层距今 3100 ± 70 年,大致相当于商代晚期。沙溪遗址的细石器(图二)主要是细石核、细石叶两类,石片工具极少。多为黑曜岩、流纹岩、燧石、硅质岩等。13 件细石核可分为两种形状,一是锥状石核,二是船底形石核。核体周身均有片疤,其中船底形石核,核底多保留一小块较平的砾石面或打击面,与我国其他地区细石器中的船底形石核多锐底的特征不同。石叶标本共有 20 件,均用间接法产生,主要有长条形和尖尾形两种。石叶的两侧缘基本平行,长度都在 3 厘米以下。此外还有少量刮削器、尖状器和“具有细石器风貌”的小石片工具等。沙溪的细石器具有比较典型的细石器技术特征,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个性,与之共存的有陶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等。该遗址是盆地内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类型。

(四) 铲霍卡莎湖石棺墓地^[5]

卡莎湖石棺墓地发现于雅砻江支流达曲河南岸的卡莎湖西北湖滨阶地。在 1984 年清理的 275 座石棺墓中,148 座出有随葬器物,其中出石器的有 42 座,出细石器的有 40 座,标本总数达 484 件,占石制品总数的 95%。卡莎湖地点的细石器(图二)主要是作为工具随葬,因而未见石核,都是十分典型的石叶工具。石制品原料多为燧石,少数为石英、水晶等。石叶近端多保留有较完整的台面,背面有一纵脊,远端有明显的内弯现象,说明这种石叶是用间接法打制成的。用细石叶制成的工具主要是在远端加工成凿形刃或尖锥刃,既可刮削,亦可用于切割和锥钻,部分标本可见使用痕迹。除细石器外,该墓地还出土有大量铜器、骨器、装饰品及毛麻制品,原报告推测其年代大致为春秋战国时期。

(五) 汉源狮子山遗址^[6]

狮子山遗址地处大渡河南岸,海拔高度约 900 米。在 1990 年的发掘中出土了数百件细石器标本。石制品原料,主要为黑色燧石和水晶。细石核有锥形、楔形以及船底形等类型。细石叶亦较多,制作十分精细,最小的细石叶仅长 2 厘米、宽 0.3 厘米、厚不足 0.1 厘米,代表着十分进步和成熟的细石器加工技术。工具种类有圆刃刮削器、尖状器和石叶工具等。狮子山遗址是盆地内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时代大致为距今 4000~5000 年左右。除以上地点外,近年来在四川其他地区的原始文化中也发现有少量细石器。在盆地西部丹巴罕格依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发现有以水晶为原料制成的细石器,标本分类中有柱状细石核,另外还有少量的细石叶^[7]。位于盆地北部的绵阳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发现有少量的细石器和用间接法打击产生的小石片^[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近年来在盆地西部地区进行调查时,在岷江流域曾采集到一批燧石原



图二 四川部分地点细石器

1~16 广元中子铺 17~24 雅安沙溪 25~30 铲霍卡莎湖

料的细石器标本^[9]，而出自墓葬的细石器过去曾在铲霍洛呷妥地点也有发现^[10]。上述材料表明，细石器在四川地区的原始文化中具有一定的时空分布范围，综合起来看，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含有细石器因素的原始文化多分布于盆地北部、西部以及西南部，地貌形态多属高原丘陵。平原地区迄今未见这类遗存。

细石器出现在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铜器时代晚期的部分盆地原始文化中，延续的时间相对较长。

在已公布的地点中，细石器均与骨器、陶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铜器等其他遗物共存，属于不同特征或类型的考古学文化，迄今未见单纯的细石器遗址。

各地点或遗址中的标本都是比较典型的细石器，其中细石核和细石叶的形态特征十分清楚。

二 四川细石器的文化特征分析

细石器在世界范围内有着相当广泛的分布，延续时间也很长，大致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乃至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较多见。根据细石器制品的形态特征和地域分布范围，可分为两大工艺传统，即分布于欧洲、非洲及西南亚地区的“几何形细石器”和分布于东亚、东北亚和美洲西北部的“非几何形细石器”。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圆体或扁体的石核剥制细石叶，并用以加工成主要工具，因而又称为“细石叶细石器”，目前我国范围内发现的细石器基本上都属于这一工艺传统。

一般认为，我国细石器技术的出现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源于华北，如宁夏水洞沟^[11]、内蒙古萨拉乌苏^[12]、山西峙峪^[13]和河南小南海^[14]等地点的石制品中，都发现有早期的细石器技术及其产品。在新石器时代直到金属器的出现，细石器在我国北方史前文化中一直较为常见，尤其是在北方草原以狩猎或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原始文化中，细石器十分盛行。因此在一段时期内，细石器被认为是北方地区狩猎畜牧经济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多和研究工作的深入，我国学术界逐步放弃了所谓“细石器文化”、“细石器时代”等定义模糊的概念，进而认识到中国地区的细石器是存在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迄铁器时代这一漫长的文化发展阶段中的一种石器技术及其产品。细石器不只是分布于黄河流域以北，在南方也有发现，同时它可以包含在渔猎、畜牧、农牧、农业等多种经济基础的文化类型中，因此它既不代表某一特定的时代，也不代表单一的文化内涵或经济形态^[15]。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四川地区细石器的文化特征呢？先前对于南方地区发现的细石器，一般习惯于从两个方面去分析它的文化意义；一是从经济生产方面着